

反思与救赎： 新大陆的发现与旧美洲的伤口

无论是体现权力白日梦的进步主义叙事，还是以善恶裁断历史的纯粹受害者叙事，都不足以承载这段繁复历史的重量。

□ 撰稿 | 毕会成

“我来到，我看见，我战胜”： 高歌猛进的征服史诗

1492年，手持卡斯蒂利亚王室旗帜的哥伦布从变动不居的海洋世界踏上巴哈马群岛坚硬的陆地。他以殖民主权的名义，完成一次历史性的宣告：这片无主的异域自此归入西班牙王国的名下。这一次踏上与宣告，并非单纯的地理抵达，而是欧洲近代殖民体系以仪式性的方式，对新大陆空间的历史进驻与秩序征用。

此后五百年间，西方史学持续地以线性目的论的进步史观定格这一历史瞬间：欧洲文明冲破重洋阻隔，将理性、技术与基督教秩序带入另一个半球。1492年之前，草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从中国的山海关到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高地，亚欧帝国各自建起了它们的长城（Great Wall）；1492年之后，海洋成了新旧大陆的分界线，

但已经没有长城可以把它们分开了。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史真正形成了，1492年成了现代性的原点。

在这套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欧洲被不由分说地预设为现代历史主体性的承载者，垄断了现代性展开的全部方向；美洲原住民社会则被排斥在历史时间之外，被停滞、蒙昧、绝望统治着，数千年都在等待那条注定要到达的欧洲之船，接受它的介入、整合、收编与救赎。

美洲的征服过程似乎也印证着欧洲人所谓的天命所归。科尔特斯仅凭六百余人的兵力，就攻陷了拥兵数十万、人口逾千万的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更是率领168人的先遣队颠覆了疆域辽阔的印加帝国。当他们深入内陆腹地，印第安人更以集体性死亡的方式为他们清空前进的路：农田荒芜了，城市废弃了，空寂的月光下只有无尽的旷野和幽灵般出没的幸存者。呈现在他们面前的